

## 第二章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與意涵

冷戰結束之後，兩極的權力結構瓦解，馬列意識形態也面臨崩潰，民族主義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呈現復興的趨勢，尤其是前蘇聯共產集團的國家，民族主義成了重新凝聚國家的手段。在中國，民族主義復興的過程，除了是填補意識形態的空缺之外，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所遭遇的一系列國際及國內層面的危機，亦是探討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因素。而若要探討中國民族主義產生的影響，首先必須先了解的就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及意涵，否則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分析，將可能產生不當的預測。<sup>1</sup>因此，本章將從冷戰後中國面臨的國際及國內環境，來探討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及特色。

### 第一節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國際因素

關於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國際因素，從冷戰後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轉變來看，對中國民族主義衝擊最大的，莫過於全球層次的全球化趨勢，以及國家互動層次的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的論述，以下將分別探討這兩個因素對於中共建構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力。

#### 一、全球化趨勢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

全球化與民族主義常被認為是兩種對立的現象，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使得世界朝向整合的目標前進，從全球化的思考脈絡來看，不論是國家、非國家的行動體都是全球網路中的重要角色，因此過去民族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在全球化的情境之下受到了不小的衝擊。相對於西方世界全球化趨勢的快速發展，在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則產生不少抵制的力量，而最為突出的就是民族主義了力量，他們認為面對以西方為取向的全球化，非西方地區應堅持從自己的文化體驗去詮釋自己的文化。

---

<sup>1</sup> 鄭永年，「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收錄於鄭永年、林佳龍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2001年4月)，頁433-434。

冷戰後全球化趨勢對中國來說既衝擊了中國與世界的既有關係，另一方面也快速地改變了中國大陸對世界及其自身的認識圖像，這種衝擊與認知產生交互的影響作用，衝擊影響了原有的認知，而認知的重新調整又產生了對衝擊的調整，進一步回頭改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sup>2</sup>觀察全球化對中共的衝擊，從其對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影響來看。首先，在政治層面，全球化的資訊傳遞將對中共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由上往下的政策貫徹產生不小的衝擊。<sup>3</sup>此外，如法輪功事件的傳播透過全球化的資訊傳遞，也將使得中國民間團體的力量將更具影響力。其次，從社會層面來看：面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傳遞，中國要求的一元化的認同將顯得困難許多，尤其是受到壓迫的人民。雖然現在中共可以透過強調愛國主義來強化認同，但可能產生的問題就是人民認同的是中國還是共產黨的問題。<sup>4</sup>第三，從經濟層面來看：雖然經濟全球化可以使得中國搭上這股浪潮促進經濟的發展，但在此同時，中國仍須面對的是經濟全球化背後，其實是帶有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的現實。<sup>5</sup>

雖然對抗全球化所產生的衝擊，不少國家都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但在全球化影響力的制約之下，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操作，已經無法在像工業主義時代那樣有效。因而中共在民族主義的操作上，轉而強調回歸傳統文化或文明，以維繫中國大陸的內聚力，但如此操作的同時，卻也產生許多認同危機的出現，尤其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強調民族主義的同時，其實也可能加強了分離主義的趨勢。<sup>6</sup>此外，人民認同的是中國還是共產黨，也是中國在操作民族主義議題上面臨的一項難題，從中國人民的反西方反日情緒濃厚，但是對於共黨的活動卻興致缺缺，可以看出共黨所面臨的危機。在資訊化與全球化的時代，網路空間的興起，

---

<sup>2</sup> 徐斯儉，「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宋國誠主編，**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卷二**（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2年11月），頁86。

<sup>3</sup> 黃衡平，「全球化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俞可平編，**全球化與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49。

<sup>4</sup> 田麗虹，「改革開放後中共政權合法性的維繫：民族主義與合法性」，**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6期（2002年7月），頁26。

<sup>5</sup> 徐斯儉，「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頁92。

<sup>6</sup> 周敏凱，「全球化與民族主義」，**國際觀察**（北京），（2005年5月），頁20。

對於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面臨嚴峻的考驗，同時也使得傳統主權的概念受到了挑戰，由威士發理亞主權觀所延伸出來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正逐漸被新的主權觀念所延伸出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所替換。而在此氛圍之下，中共強調民族主義的優先性，雖然有助於國內的團結與認同，也是一套尋求政權穩定的方式，但是以這套邏輯操作的民族主義，在全球化趨勢之下可能將顯現出幾點不利的地方。<sup>7</sup>

1. 對立的強化：企圖通過民族主義的訴求來解決認同與身份危機，但卻可能激化與產生強烈大中國意識的出現，這不只將會升高東西方之間的對立，更將會造成兩岸之間的緊張。
2. 矛盾的產生：中共在操作民族主義問題，皆是採取一種凸顯我者與他者不同的文化民族主義方式，過份強調本土化的同時，可能將造成的是內部本身的矛盾與對立，尤其是中國在強調中華文化優越論的同時，更認為中華文化不只適用中國，更可適用於東北亞或東南亞，從而造成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的表現，反而引起廣大的反彈聲浪。
3. 僵化的意識型態：過份操作民族主義的結果，造成民族主義容易為有心人士所炒作，很多事情亦很容易被上綱到民族主義而引發對立。

至於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應該如何的被建構以及因應上述的一些衝擊，張豐清認為應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與單純的反西方的情緒作一番區別，將過於激烈的情緒從民族主義中抽離，才是對中國有利進步的民族主義。<sup>8</sup>吳國光也認為應該鼓吹一種理性的民族主義，並通過更為深刻的制度變革以增強國力抗衡圍堵中國。<sup>9</sup>宋國誠則認為一個能化解全球化危機並在危機下壯大的中國，將會是一個既鞏固又成熟的新型世界強國，因而全球化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機遇也是

---

<sup>7</sup> 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與兩岸關係**（台北：揚智出版社，2000年），頁34-38。

<sup>8</sup> 張豐清，「全球化時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覺醒與構建」，**武漢理工大學學報**（北京），第17卷第3期（2004年6月），頁364。

<sup>9</sup> 吳國光，「以理性民族主義抗衡圍堵中國」，汪暉、余國良編，**全球關係中的中國困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98年），頁115。

挑戰，若是妥善的處理，21 世紀中國崛起將不會是一個夢想，而是民族奮進的義務。<sup>10</sup>因此，中國民族主義在全球化的進程下，是一段認識自我評價自我的過程，透過這種方式，中國人才能重新確認到了中國與外國的不同之處，重新確認自己是中國人，從這種角度來看，中國民族主義應該是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的客觀過程中的一個自然現象。<sup>11</sup>

## 二、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對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影響

中國民族主義和西方民族主義產生一項重要的區別，在於和西方民族主義相較，中國民族主義表現出更具有反應性(receive)，也就是它不是原生自發的，而是對環境的一種反應。因此，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並不完全是因為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中國有能力來改變現存的國際關係秩序，而更多是中國面對國社會壓力的回應。<sup>12</sup>冷戰後國際社會面對中國，相當重要的議題就是關於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的爭論，而中國民族主義中很大的一部份，也是針對這兩者爭論產生的回應。

關於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的產生，從中國在鄧小平 92 南巡之後更加堅定確立的改革開放的路線之後，中國大陸的經濟開始了快速飛躍的成長，不僅在 1990 年代其經濟年成長率平均接近 8%，在 2000 年成爲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同時其對外貿易總額也快速增加，在 2000 年時已經成爲世界第七大貿易體，在 2002 年更超越美國成爲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而 2006 年，根據大陸外匯管理局的資料指出，截至 2006 年 9 月底，大陸外匯存底目前已跨越 1 兆美元大關，穩居全球第一，國際貨幣基金會（IMF）預計，大陸到 2010 年，外匯存底將升至

---

<sup>10</sup> 宋國誠，「全球化與中國：機遇、挑戰與調適」，宋國誠主編，**21 世紀中國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2002 年 11 月），頁 40。

<sup>11</sup> 青山留妙，「冷戰後中美關係中的中國大眾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310-311。

<sup>12</sup> 鄭永年，「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收錄於鄭永年、林佳龍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 381-382。

2 兆美元。<sup>13</sup>這種數據表示，中國的經濟已經有了非常傲人的成就，是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成員之一。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綜合國力也隨之提昇，在九十年代，中國投注相當多的資源在軍事現代化上，其軍事預算以近 15% 的年成長率增加。<sup>14</sup>此外，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國在國際的地位更加提升。不僅活躍的利用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優勢發言位置，更積極的參與亞太經合會、東協區域論壇、亞歐會議等等，在這些會議當中國的發言都具有指標性的作用。由此可見，1990 年代末期中國在經濟、軍事、政治各方面都獲致可觀的國際地位。<sup>15</sup>

中國崛起既然已經成爲了不容否認的事實，中國在國際體系當中的角色，也必然成爲各方關注的焦點，在國際政治史與霸權理論中，既存國際體系的主要強權，如何面對新崛起的強權，將是影響國際秩序的重要變數。<sup>16</sup>因此，在 20 世紀 1990 年代中期，一場對中國採取「接觸」還是「遏制」戰略的激烈爭論展開了。主張「遏制」戰略者在國際上開始鼓吹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之說，認爲中國的經濟實力嚴重受到低估，若由購買力評價的角度出發，中國已是世界前幾名的經濟體，而其所衍生出來的政治影響力更是不容低估。<sup>17</sup>一些評論家們開始擔心中國正在將它的經濟實力變成政治軍事力量，而根據權力轉移理論，像中國這樣新生力量的崛起將不可避免地會破壞國際體系中相關力量平衡。從這種觀點出發，無論它的意識形態或意圖如何，中國都是一種威脅，因爲它對現有的權力平衡將是一種挑戰。在亞洲則由於日本力量衰退，中國實力上升的背景，也有學者推斷東亞將會發生激烈的動盪。<sup>18</sup>

此外，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的決策層當中亦存在著不小的影響力，美國國會中

---

<sup>13</sup> 「全球第一:大陸外匯存底突破 1 兆美元」, *經濟日報*(2006 年 11 月 7 日)。

<sup>14</sup> 童振源,「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轉型與挑戰」,林佳龍主編, *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 (台北:時報文化, 2004 年 1 月), 頁 32-33。

<sup>15</sup> 賴怡忠,「中國大陸和平崛起～是問題還是事實?」,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 第 10 期(2004)。

<sup>16</sup> 林佳龍,「中國的國家戰略與對外政策」,林佳龍主編, *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 頁 210。

<sup>17</sup> *中國時報*(2000 年 12 月 17 日), 第十五版。

<sup>18</sup> Aaron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 (1993), pp.5-33..

的一些保守派成員和支持者以及他們的智囊團們（自稱為藍隊）就認為，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在 20 世紀 1990 年代後期採取的「戰略接觸」政策背叛了美國的利益，導致了中國威脅的增長，此後藍隊在炒作中國威脅論議題上也取得了一些的成功，例如他們通過立法，授權起草了兩個官方性的關於中國軍事力量的報告。<sup>19</sup>

中國威脅論不僅僅存在於西方學術界與決策層當中，也存在於亞洲的國家當中。例如一部分的日本人觀念仍停留在二次世界大戰前，還相信帝國主義的邏輯，認為日益強大的中共必定像戰前列強一般，進行對外擴張與侵略，建立中共的勢力範圍，因而相信中國威脅論。<sup>20</sup>近年來中共不斷增加的國防開支，不但是西方中國威脅論者所念茲在茲的議題，亞洲各國亦深受其影響，也因此中國的崛起是否成為威脅，似乎是全世界所共同關注與研究的重要議題。

針對西方關於要警惕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的論調，中國官方與學術界的文章亦有不少的反彈。並且認為中國威脅是從歐洲大國的暴力崛起和衰敗角度，以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來理解中國的崛起，而中國的成功是建立在東亞秩序的和平與穩定基礎之上的，中國威脅論是西方捏造出來的，與他們的後冷戰世界的冷戰思維有關。<sup>21</sup>正如坎貝爾（Campbell）所說：「危險不是一種客觀條件，對那些可能變成一種威脅的人來說，它不是獨立存在的，危險是一種解釋出來的效果。」<sup>22</sup>因此中國的崛起或許並不是問題，而是中國威脅論的說法製造了麻煩。這些說法使中國的形象受損，使中國的鄰國和外國投資者感到面臨風險，而糾正中國威脅論這一謬誤應成為正確理解中國的一部分。<sup>23</sup>就中共而言，鼓吹與散佈中國威脅論有兩類別有用心的人，一類是借中國威脅論挑撥中共與周邊國家的關

---

<sup>19</sup> William A. Callahan, 「中國民族主義的界限—中國威脅論：建構認同的一種手段」, *世界經濟與政治*, 第 11 期(2005), 頁 35。

<sup>20</sup> 夏冰, *日本如何面對中國*(香港, 明鏡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頁 7-15。

<sup>21</sup> 張明明, 「解析中國威脅論」, *理論前沿*(北京), 第 21 期(2003), 頁 18-22。

<sup>22</sup>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p.1-2.

<sup>23</sup> 薛龍根, 「評析中國威脅論」,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北京), 第 5 期(1997), 頁 25-29。

係，敗壞中共的國際形象；另一類則是以中國威脅論為日本擴充軍備製造藉口，以減少並消除周邊國家對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疑慮。<sup>24</sup>

冷戰後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的論述，一方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國際上展現，另一方也象徵著西方看待中國的角度。這兩者都分別為中國民族主義提供了不少建構的題材，中國的崛起使得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與凝聚力增加，喚醒了歷史中深處的強國情結；而對於西方中國威脅論的提出，亦喚醒了中國歷史中的受害者心態。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背景，即為中國正崛起為世界大國，但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卻仍然由西方大國主導，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框架從過去的如何救國，轉變成現在的如何使中國成為世界領導者。<sup>25</sup>中共透過對中國威脅論的駁斥，不單將是凝聚中國的力量，更是能從中利用中國的榮耀，把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實體從全球化的世界中區分出去，以利中國能在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獲得獨立的地位。<sup>26</sup>

## 第二節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國內因素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國內因素，本節將從政治認同、內部民族認同與外部民族認同的台灣問題，來探討冷戰後中共在這些議題上遭逢哪些危機情境，而民族主義在這些議題當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與作用。

### 一、政治認同:民族主義與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探討

九零年代初冷戰結束對於中國來說，不僅僅是美蘇的兩極權力格局瓦解與國際權力的轉移，影響更為重大的，就是共產主義、馬列主義作為國家統治正當性意識形態的一種瓦解與破裂。而中國作為少數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不論在國際

---

<sup>24</sup> 王良能，**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年2月)，頁257-258。

<sup>25</sup> 吳國光，「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變遷」，收錄於鄭永年、林佳龍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2001年4月)，頁329。

<sup>26</sup> William A. Callahan，「中國民族主義的界限—中國威脅論：建構認同的一種手段」，頁38-40。

與國內都面臨到，許多因轉變而帶來的壓力與挑戰，但是中國並未如東歐及蘇聯共產集團一般的瓦解，在於中國的改革開放，走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改革路線。而這種路線的運作，民族主義在其中扮演一項重要的角色。早在九零年代初，北京上海的一部分青年知識份子就公開提出：要用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替代共產主義作為中共正統意識型態，以作為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基礎。<sup>27</sup>

關於合法性的來源，最著名而深具影響力的自然是 Max Weber 的權威型態論述，其從經驗分析出發，提出了三種合法性基礎：卡理斯瑪（charismatic）、傳統的（traditional）、合理的（legal-rational）。<sup>28</sup>而當代政治學家 David Easton 將合法性的基礎類型作了更進一步的分析，將合法性的來源歸於意識型態、結構和個人品質三方面：<sup>29</sup>

1. 意識形態：尋求共同利益的象徵物、培養或加強對政治共同體（國家）的認同意識。
2. 結構：對於體系現行的政治制度和規範，透過價值認同與政治權威灌輸體系成員形成認同。
3. 個人基礎：以『物質利益』（或稱特定支持）的表現，輔之以價值取向的灌輸，形成對權威任職者的合法感。

關於民族主義與政權合法性的聯繫，在眾多中國民族主義的文獻資料中，均不約而同地認為：1990 年代中共民族主義的興起，是爲了填補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崩解後的真空，並增強中共政權續存的合法性。<sup>30</sup>然而爲什麼冷戰後民族主義

<sup>27</sup> 鄭永年，「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國民族主義」，**聯合報**（1997 年 8 月 18 日），第 14 版。

<sup>28</sup> 陳曦，「權威危機與合法性危機」，**中國論壇**（北京），第 30 卷第 10 期（1990 年 8 月），頁 5-8。

<sup>29</sup> David Easton 著，王浦劬等譯，**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台北，桂冠書局，1992 年），頁 341。

<sup>30</sup> 採此種論述觀點的文獻大致有：李福鐘，「民族主義與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的重新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 39 卷第 6 期（1996 年 6 月），頁 36~49；周玉山，「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中國大陸研究**，第 39 卷第 8 期（1996 年 8 月），頁 6~20；蘇紹智，「區別兩種民族主義」，載於王鵬令主編，**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台北：時英出版社，1997 年），頁 184~192；虞義輝，「從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看中共的愛國主義」，**復興崗學報**，第 60 期（1997 年 6 月），頁 327-345；



會成爲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其實從 David Easton 對於合法性的論述來看，中共所要尋求的不外是意識型態、結構規範與個人信仰三種選項之一。首先，個人魅力在目前中共政治中，似乎已經不可能再出現一個類似於毛澤東或是鄧小平的政治強人。其次，政權結構方面，中共目前的政治結構似乎很難如西方的民主制度一樣，透過制度的運作使得政權獲得合法性。也因此，中共僅能從意識型態中去尋求政治社會化的合法性基礎。而在意識型態的層次上，由於同時受制於兩相衝突的共產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潮，中共政權處於一個社會主義不斷受到質疑、放棄社會主義又如同在意識型態與政治上自殺的兩難情境下，其所能選擇運用、同時適應於二者的意識型態，只有「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sup>31</sup>

但事實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不能完全滿足於作爲一個意識型態所具備的所有條件，只能說是一個空洞的政治口號。中共官方深知在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真正吸引人心不再是社會主義、反而是「有中國特色」；而「有中國特色」轉化在具體實踐的政治宣傳上，其實就是所謂的愛國主義，其本質正是民族主義。

## 二、內部民族認同:少數民族問題

冷戰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除了上節討論的政治認同層面之外，在民族認同上，也產生了衝擊合法性的危機因素。「蘇東波」和平演變的結果，前南斯拉夫分裂成五個國家，前蘇聯解體爲十五個國家，無疑都對冷戰後中共政權產生很大的衝擊。根據西藏自治區委黨校學者普希次仁的分析，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對待民族問題的失誤有：<sup>32</sup>(1) 沒有充分認識社會主義時期

---

林蔚 (Arthur Waldron)，「保釣暴露中共合法性危機」，**自由時報**，1996年10月3日，4版；  
殷惠敏，「從社會主義到民族主義」，**九十年代**(香港)，(1996年11月)，頁76~77；  
廖光生，「民族主義—北京最後的政治法寶」，**中央日報**(1997年7月26日)，第7版。

<sup>31</sup> 田麗虹，「改革開放後中共政權合法性的維繫:民族主義與合法性」，頁26。

<sup>32</sup> 普布次仁，「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失誤和啓迪」，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編，**民族研究月刊**(北京)，第8期(1995)。

民族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和重要性，從而產生超前意識，以為已經一勞永逸解決民族問題，放鬆了民族工作，造成長期決策失誤；(2) 用高度集權來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劇了民族矛盾，導致了民族分裂；(3) 借口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宣揚大民族主義，傷害少數民族幹部和知識份子，實行民族同化政策。

至於中共面對民族問題所產生的危機，董立文認為當前中共民族認同危機表現在兩種層面上，分別為內部的少數民族認同問題，以及外部的台灣中華民國的認同問題。<sup>33</sup>其中內部的民族問題危機，反映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後所發表的《論十二大關係》的講話中，關於差距問題與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問題：<sup>34</sup>第一，是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擴大，國民收入過分向個人傾斜，國家收入比重過低，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懸殊；第二，則是中央與地方關係，這牽涉到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與全國經濟的協調發展。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已經關注到少數民族問題，並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落後的危險性，隨著改革開放的不平等發展，這將可能會是關係到國家民族團結的重大問題。

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除了上述的差距問題之外，探究其深層原因還包括：<sup>35</sup>

1. 地理分布因素:大陸少數民族絕大部分是跨境而居，同一個民族因為疆界被硬生生地被分屬兩個不同國家，因而在政治訴求上，傾向於爭取自己的民族獨立建國。
2. 國外勢力的介入因素:從中國近代史觀察，可以發現列強為了瓜分中國，總是先從少數民族地區開始下手，挑撥或協助其獨立，這種情形在跨境而居的民族上特別明顯。

---

<sup>33</sup> 董立文，「論 90 年代中共民族主義」，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頁 52。

<sup>34</sup> 同上註，頁 53。

<sup>35</sup> 何秀珍，「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分析」，施哲雄主編，**發現當代中國**(台北:揚智出版社，2003 年 10 月)，頁 194-195。

3. 宗教因素:中共一向認為宗教與共產主義是不相容的，因此對於有特殊信仰的少數民族來說，其宗教信仰也就受到中共的打壓，因而反而可能成為助漲少數民族獨立意識的重要力量。
4. 民族矛盾因素:中共從建政之後，曾為了方便統治，而將漢人遷徙到少數民族地區居住與統治，因而使得漢人與少數民族之間產生衝突的矛盾。

民族認同危機的深層矛盾伴隨著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地區差距，使得少數民族似乎成為體制外的社會群體，他們的群體利益不被考慮，也缺少代言人。中共政權似乎也已經認識到了這些矛盾，並且將之稱為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sup>36</sup>但在這些矛盾當中，中共似乎也無意大步邁向政治或社會制度面的改革進程，來解決少數民族的相對剝奪，反而企求以民族主義的訴求以及經濟的發展，來掩蓋社會上的諸種矛盾。如中共在第八個五年計畫(1990-1995)便安排先發展省市與少數民族地區互相合作支援，並且安排少數民族地區重點發展能源、原料、交通運輸及農林牧業等項目，鼓勵邊境貿易，期望能縮短少數民族地區與沿海先發展地區的經濟差距。此外，中共也提出的「共同繁榮、共同富裕口號」，希望能緩和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藏族和維吾爾族)與漢族之間的矛盾。<sup>37</sup>

對於民族問題的處理，從前蘇聯國家的分裂來看，這是一個長時間與複雜的工作，不是短時間能夠化解的矛盾，強調民族主義訴求與經濟發展是中共目前的解決方式，但是否能真正化解其中的矛盾，將是值得持續觀察的議題。從中共針對少數民族矛盾並訴求民族主義態度，可以發現一項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如同董立文所認為的，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是因為民族認同的強烈訴求促成其情緒的高漲，反而是民族認同的強烈危機，才使得中共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sup>38</sup>即中共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國家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是一套由國家所建構的民族國家

---

<sup>36</sup> 陳志柔，「中共 16 大後社會情勢分析」，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頁 95。

<sup>37</sup> 李鵬，「做好民族工作，為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而努力奮鬥」，**光明日報**(北京)，1990 年 2 月 2 日。

<sup>38</sup> 董立文，「論 90 年代中共民族主義」，頁 54。

觀，當領土內發生民族認同危機時，國家必須強調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

### 三、外部民族認同:台灣問題

由於兩岸之間複雜的歷史淵源，使得台灣問題成為刺激中國民族主義的一項重要因素，尤其是臺灣問題事涉中國主權問題，若是處理不好更將會對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產生衝擊。民族主義的情緒伴隨著中國逐漸崛起不斷上升，其中的內涵也夾雜了一些反西方的情緒，這也使得台灣問題更牽連到了美國是否干涉，以及對台灣民主體制是否認同等問題。總之，兩岸關係的一舉一動都將可能是刺激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因素。

至於台灣問題為什麼會成為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根源。首先，在中國人的歷史當中，對多數的中國人來說，統一是一個民族國家的重要因素，統一和民族國家的完整性是可以畫上等號的。而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概念又是追求富強，強大的指標的最低限度，就是避免內憂和外患，因此台灣問題不僅關係國家統一的問題，而且也是關係到強政府的問題。<sup>39</sup>台灣問題事關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建構的核心價值，對於台灣問題的爭議就難有妥協的立場，因為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是一種必須實現的終極目標。<sup>40</sup>以領土完整的民族主義價值為例，諸如中俄或中印邊界問題可以透過外交斡旋的方式擱置或尋求協議，但台灣問題則不能；中日釣魚台的爭議也只要不過度涉及經濟利益也可以暫時擱置，或只透過外交辭令重申主權立場，但台灣問題則不能。<sup>41</sup>

台灣問題除了牽涉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價值之外，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對中國來說，亦產生了對於政治體制認同上的危機，這反映於江澤民在 1996 年台灣首

---

<sup>39</sup> 鄭永年，「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鄭永年、林佳龍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 33-34。

<sup>40</sup>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問題」，頁 401。

<sup>41</sup> 石吉雄，「價值與現實的匯流:中共使用武力的戰略文化內涵」，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95。

次總統直選之後，發表關於講政治的談話，他強調：<sup>42</sup>

「民主的發展總是同一定的階級利益、經濟基礎和社會歷史條件相連繫的……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比西方國家的三權鼎立制度要民主的多、優越的多。」

這篇談話顯示出台灣民主化的意義，對於中共的政治體制認同將產生挑戰，因而迫使中共官方當局不得不正面對這個問題做出理論與實踐上的回應。

近來，中國民族主義在針對台灣問題態度上仍然視為不容挑戰的議題，從 2004 制定的反分裂法來看，反分裂法是以法律成文化方式，界定北京的反台獨政策、法律化一個中國與台灣地位、規定兩岸關係互動架構與內容、並進而替武力威脅的非和平方法建構其國內法律基礎。<sup>43</sup>趙穗生就認為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反分裂法在 2005 年 3 月通過的一股重要力量，反分裂法的制定一方面設定了一個基準點，以防止國內激烈民族主義者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展現出北京領導對台政策的決心。<sup>44</sup>

而從反分裂法的制定來看，除了有其外部力量，可防止國際力量介入兩岸關係的用意之外，明居正認為其內部的因素亦不可忽略，一個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胡錦濤剛剛上臺，他的政治地位其實還不十分鞏固，所以透過對台灣問題的重申立場來鞏固其政治權力；而另一個目的就是，從 2004 年末開始到 2006 年初，有很多人公開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根據法輪功的統計資料，到現在已經超過兩百七十萬人公開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這些共產黨的相關組織。<sup>45</sup>或許實際上的數據，並未如上述法輪功的統計資料這麼的多，但無論如何對於共產黨來說，都是建黨以來 80 幾年來未曾發生的事情，所以這對中共形成了一個很

---

<sup>42</sup> 江澤民，「關於講政治」，*人民日報*(1996 年 7 月 1 日)，版一。

<sup>43</sup> 楊永明，「反分裂法：啟動兩岸關係與台海安全的結構變」，*楊永明國際事務首頁*。  
<<http://140.112.2.84/~yang/Comment-150305.htm>>

<sup>44</sup> 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Beijing's Policy toward Taiwan: The Making of the Anti-Secession Law", (Taipei: The 35<sup>th</sup> Taiwan-American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August 28<sup>th</sup>-29<sup>th</sup> 2006), p.1.

<sup>45</sup> 明居正，「明居正教授談反分裂法」，*大紀元*(2005 年 7 月 9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5/7/9/n980428.htm>>

大的威脅，而反分裂法的制定將可用來進行民族主義的動員和內部政權的鞏固。

從上述可見，台灣問題對於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共政權來說事關重要，中共官方在針對台灣問題的民族主義議題操控上也是非常用心，除了政策層面的宣示，2006年中央電視台製播的施琅大將軍電視劇，則是透過輿論強化其對台政策與民族主義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透過強調中央政府武力收復的歷史劇，使更多民眾了解台灣與大陸不可分的歷史聯繫，更可堅定大陸民眾在必要時，以非和平手段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信心。<sup>46</sup>

### 第三節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復興經由國際及國內的種種危機所導致，雖然官方的愛國主義論述，在民族主義內涵上扮演主導性的地位，但是隨著民族主義的影響更加的深入民間，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產生了許多與官方愛國主義不同的特點。此外，現今中國不論是在下一個世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或是中國共產黨在十五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實現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目標，都反應民族主義仍將是今後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方向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sup>47</sup>因此，觀察冷戰後民族主義所展現的特點，也必須關注的問題，就是它在國家戰略發展目標中扮演的角色。

#### 一、1990年代中共的愛國主義內涵

中國民族主義體現在政治層面的意涵，最為重要的就是官方愛國主義的宣導，而為什麼愛國主義在九零年代獲得重視？從上兩節所討論的一系列危機當中可以作一個假定，即愛國主義是九零年代中共政權實踐其政策目標的一個重要手

---

<sup>46</sup> 張裕亮，「冰點副刊靈魂不再」，**展望與探索**，第4期(2006)，頁15。

<sup>47</sup> 周建明，「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問題」，收錄於鄭永年、林佳龍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395。

段，至於如何推斷這個假定為真，就必須觀察 1990 年代愛國主義所具有的實質內涵。

1990 年代中共愛國主義的具體內涵，主要體現就是在領導人的言論當中，以及 1994 年所提出的愛國主義實施綱要當中。首先領導人的言論最為著名的就是 1990 年 5 月 3 日，江澤民在北京紀念五四運動 71 周年前夕，發表題為《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的演講，指出：<sup>48</sup>

「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容。我們所講的愛國主義，作為一種體現人民群眾對自己祖國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進歷史發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同維護國家獨立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在現階段，愛國主義主要表現為獻身於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獻身於促進祖國統一的事業。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這是對我國現階段愛國主義特徵的精闢概括。」

從以上的講話當中可以看出江澤民的愛國主義思想，除了繼承鄧小平的觀點之外，也強調現階段愛國主義的目標，就是要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而題為愛國主義和知識份子的使命，其實也反映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所面臨的危機，對於知識份子與青年灌輸愛國主義思想，將是工作的一大重點。

1994 年 9 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傳部發表了《愛國主義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全文 8000 字，共 40 條，分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原則、主要內容、以青少年為重點對象、建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創造愛國主義教育的社會氣憤、提倡必要禮儀、增強愛國意識、大力宣傳先進典型及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領導等 8 個部份。<sup>49</sup>

---

<sup>48</sup> 江澤民，「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份子的使命」，**新華網**(1990 年 5 月 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18/content\\_2591767.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18/content_2591767.htm)>

<sup>49</sup> **人民日報**(1994 年 9 月 7 日)，版 3。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曾指出，《綱要》是在黨中央直接領導和關心下起草的，同時還得到了國家領導人和老同志的關心與指導。<sup>50</sup>總之，《綱要》的頒布與實施是獲得中共高層相當關注之下完成，其所具有的地位也由此可見。董立文就認為這是中共調動整個黨與國家機器的力量試圖發起的一個群眾運動，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是中共政權合法性基礎重建過程的一部份。<sup>51</sup>此外，他認為綱要的愛國主義原則，是透過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肯定，將之作為中共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具體實在內容。<sup>52</sup>

至於中共在愛國主義教育上，1990年代除了在歷史教學中繼續強化愛國主義教育之外，與過去不同之處，在於改變了過去狹隘的國際主義教育，而向「國際意識」和「全球觀念」教育的方向轉化。<sup>53</sup>這也顯示改革開放的政策背景充份的反應在歷史教育當中，即在保持自己優秀傳統之外，更需吸收他人長處為我所用，積極進行國際合作和競爭。

總結以上愛國主義的內涵，可以發現一些九零年代愛國主義的特點(1)著重青年與知識份子愛國主義的灌輸。(2)愛國主義將愛國與愛黨充分結合。(3)1990年代的愛國主義的階級認同較不明顯，而是更多的表現民族認同。<sup>54</sup>從1990年代中共愛國主義展現出的內涵，可以發現是針對國際以及國內所面臨的一系列危機的反應，愛國主義透過官方的形塑，填補了意識形態的空缺，成為了官方政策實踐的一個重要手段。而受到19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發起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影響，也助長促成了日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sup>55</sup>

而愛國主義雖然成功的凝聚了中國人民，但觀察其內涵卻也展現出不少矛盾

---

<sup>50</sup> 同上註。

<sup>51</sup> 董立文，「論 90 年代中共民族主義」，頁 69。

<sup>52</sup> 同上註。

<sup>53</sup> 陳其，「中國中學歷史教學中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國際主義教育:1949-1999」，收錄於鄭永年、林佳龍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 361-362。

<sup>54</sup> 李氣虹，「後冷戰時期中共的民族認同」，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1998)，頁 120。

<sup>55</sup> 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31, No.3, (1998), p.287.



的地方。首先就是愛國主義既然強調要建設與對外開放；但另一方面它卻又需要傳統文化來維護統治目的。這反映了中國仍須面臨的一個老問題，即西方價值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矛盾，而中共的體用原則在愛國主義當中也充分顯現，即傳統文化是意識形態的本體，而改革開放的價值則是實用層面，並不影響意識型態中的核心部份。<sup>56</sup>此外，將愛國與愛黨相結合，劉平鄰就認為在愛國主義的論述中，反映中共把國家與政府當作其私產的心理，因此，這種對愛國主義的詮釋，現階段雖然成功的填入意識形態的空缺當中，但是其存在的矛盾，仍有可能在未來變成一個不定的因素影響中共政權的穩定。<sup>57</sup>

## 二、冷戰後中國民間民族主義的特色

冷戰後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其實可以視為是對中共愛國主義的一種回饋，而此種回饋有正面亦可能有負面，這也反映民族主義是一把雙面刃甚至是多面刃。民族主義雖然有助於政權合法性的鞏固，但另一方面若是民族主義的情緒太過強烈，就會變成一個不穩定的因素，從而損害政府的利益。<sup>58</sup>俞新天在探討中國對外戰略的文化思考時就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主流是積極的，增強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然而其中也有許多不健康的傾向，主要表現為：<sup>59</sup>陷入百年悲情，走不出自虐者心態，甚至懷有狹隘的復仇情緒；暴發戶心態，自我膨脹、目空一切，認為中國天下第一；不能以平等精神對人，崇洋媚外等。目前中國人總體文化教育水平較低，大國心態和民族文化中心主義根深蒂固，在國際社會表現還不成熟，因此還需要長期的教育和引導，才能消除民族主義的不健康因素。

民間民族主義情緒在冷戰後展現出的特色，既有正面亦有負面，主要是透過

---

<sup>56</sup> 董立文，「論 90 年代中共民族主義」，頁 70。

<sup>57</sup> 劉平鄰，「從政府、民族、國家來分析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劉青峰主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 205。

<sup>58</sup> 鄭永年，「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頁 444。

<sup>59</sup> 俞新天，「中國對外戰略的文化思考」，王緝思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台北: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25。

大眾傳媒、知識分子的言論以及互聯網(internet)這些資訊傳遞載體所展現出來，而仔細探究這些內容則可以發現一些民間民族主義的特點。首先，從對中共合法性具有正面意義的民族主義情緒來看：

(一) 民間民族情緒反映了歷史中強國情節，帶給中國民間民族情緒一種正面的力量，使得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逐漸提高。這可以從 2005 年 Pew Research Center 所作的民調當中獲得，調查顯示中國人民對自己國家滿意的程度為 72%，為各國當中最高。<sup>60</sup>更有 88%的中國人民認為自己國家形象良好，<sup>61</sup>由此可見中國人民普遍深具民族自信心，這或許也反映出中共官方多年來政治社會化與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的功効，以及人民對中國崛起實現的自信心。

(二) 愛國主義的政治社會化影響，使得許多年輕的知識份子懷抱愛國雄心。從 1996 年由一群年輕大學生所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以及學生和記者合撰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全球化下中國的陰影》等書，都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反映出民間民族主義的情緒高漲，年輕的知識份子也扮演著引領風潮的角色。

(三) 媒體輿論的資訊傳遞更加容易強化民族主義情緒。丁學良認為中國大陸民眾主動或是被動的從主流媒體中，接受政府官方經常的重複涉及民族主義資訊，由於這些資訊的重複，因此容易滲透到人民日常知識的領域，強化民族主義情緒。<sup>62</sup>例如，在 1997 香港回歸以及北京申奧成功時，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中央一級傳媒大肆報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洗刷了百年來的列強侵略恥辱，更取得國際間的輝煌成就；或者，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時，人民日報國際部所屬的環球時報就大幅刊載，將殉職的數位記者描

---

<sup>60</sup> 「對本國現狀滿意表」，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3504875.html>>

<sup>61</sup> 「中美兩國形象調查」，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3504875.html>>

<sup>62</sup> 丁學良，「民族主義成為意識型態後時代的意識形態：為什麼？」，洪泉湖、謝政諭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2000 年 12 月 2 日)，頁 53。

述成捍衛中國民族主意的英雄。<sup>63</sup>

(四)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民族主義在民間仍持續增溫。從 2000 到 2005 年調查報紙當中使用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用語，可以發現從 2000 年以來大致呈現的是一個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到了 2004 及 2005 年間，談論的次數都來到了一個高峰。<sup>64</sup>而 2004 與 2005 年，正好中日關係處在一個政治上最低迷的狀態，各大城市都爆發了反日示威遊行，其訴求主要在於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小泉祭拜靖國神社、釣魚台領土及台灣問題等。<sup>65</sup>另在 2005 年 Pew Research Center 民調也顯示出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形象差到了極點。<sup>66</sup>由此可見，二十一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在民間持續增溫之外，似乎也可顯示當某些議題涉及中國的國家利益及價值時，中國人民一定會站出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和價值，展現出強大的凝聚力。

此外，民間民族主義的情緒所具有的另一個情素，是歷史中遺留的受害者心態，因此當中國在國際社會當中若是遭遇到不平等的對待，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反應的相當的高昂。例如 1997 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誤炸事件所引發的反美示威遊行，根據中共公安部門的統計，約有 70 萬的學生和民眾參與，這是中共文化大革命之後，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而這種高昂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於中共統

<sup>63</sup> 張裕亮，「冰點副刊靈魂不再」，頁 15。

<sup>64</sup> 表一：21 世紀以來，中國報紙及期刊談論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數量統計

| 年度   | 民族主義       |            | 愛國主義       |             |
|------|------------|------------|------------|-------------|
|      | 期刊         | 報紙         | 期刊         | 報紙          |
| 2000 | 2          | 131        | 7          | 2168        |
| 2001 | 81         | 275        | 149        | 2445        |
| 2002 | 101        | 317        | 153        | 2182        |
| 2003 | 82         | 371        | 141        | 2577        |
| 2004 | 140        | <b>480</b> | 179        | 3723        |
| 2005 | <b>179</b> | 409        | <b>204</b> | <b>5013</b> |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期刊網

<sup>65</sup> 蔡增家，「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國崛起下中日衝突的結構分析」，*國際關係學報*，第 21 期(2006 年 1 月)，頁 46。

<sup>66</sup> 「五國好感率比較表」，*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3504875.html>>

治合法性可能產生負面意義則有：

(一) 民族主義的方向一旦失去控制將可能轉向針對政府。雖然對於民族主義情緒，許多觀察家都認為是在中共的掌控當中，但是如 Pomfret 就認為學生並不是被迫參加示威遊行，抗議活動雖然有政府的控制的因素在其中，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代表了人民的意願。<sup>67</sup> 鄭永年則認為不可低估的是民間與官方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而只要民族主義情緒會影響中國穩定，政府就肯定會參與其中。<sup>68</sup>

(二) 民族主義透過網路為載體的新型態使得官方難以徹底掌控，而網路上對於民族主義的論述不只影響政治層面，更擴散到非政治的層面的議題上。例如，在許多非政治場域中，所謂「打倒綠色台商」、「封殺綠色藝人」等，隨著台灣民主深化、台灣主體意識增強，圍繞在「反台獨」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在中國發酵。<sup>69</sup> 中國內地許多報章將這種民族主義稱之為網路民族主義，其意思就是來得快去得也快，除了一些來自中日歷史中遺留的問題之外，大部分的議題都只是一時之間的情緒抒發，充滿現實主義的色彩。<sup>70</sup>

至於民間民族主義另一項特色即網路民族主義的發展，雖然有學者認為其已經成熟，<sup>71</sup> 但是基本上一般還是認為網路民族主義在中國還是一個正在發展的現象，它與網路之外的民族主義沒有本質差異，主要在傳播和表達形式以及影響力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力量，網路民族主義展示了它的破壞性和建設性，其破壞性主要體現在極端言語、排外以及搗亂行為；其建設性則在於它表現了中國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意識，它刺激了中國網路市民社會的形成，

---

<sup>67</sup> John Pomfret, "New Nationalism Drives Beijing: Hard Line Reflects Popular Mood," *Washington Post*, April 4 (2001), p.A1

<sup>68</sup> 鄭永年，「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頁 442-446。

<sup>69</sup> 「中國偏狹民族主義高漲 不利兩岸交流」，*大紀元*(2005 年 8 月 21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5/8/21/n1026121.htm>>

<sup>70</sup> 羅志平，「歷史修正主義與新民族主義：日本修改教科書的政治效應」，*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2006 年 1、2 月)，頁 93。

<sup>71</sup> 王小東，「中國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走向成熟」。  
<<http://www.sis.pku.edu.cn/wanglian/mzzhy/readings/wangxd3.htm>>

也不斷表達、塑造和凝聚著中國人的國家和民族認同。<sup>72</sup>不過根據 2005 年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的統計，中國網民有低年齡化、低學歷化及低收入化的傾向，<sup>73</sup>這幾種傾向是否會加重網路民族主義的破壞性，想必將是未來受到關注的問題。

### 三、民族主義在中共國家戰略目標中的角色

歸納上述的特點可以發現，1990 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眾說紛紜，但從內容上看，有以下幾點特徵：<sup>74</sup> (1) 熱愛國家；(2) 強調中華民族的責任感、使命感；(3) 熱愛悠久的中華文明、傳統文化，同時採取一定的文化批判精神，強調儒學復興運動；(4) 樹立作為中國人身份認同(identity)的民族優越感、自豪感；(5) 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策原則下，不畏強權、反對霸權，提倡和平發展。而民族主義在表現形式上，有以下幾個主要方面：<sup>75</sup> (1) 忠於國家利益、民族利益；(2) 受歷史影響，在民族危機到來時，則表現出很強的凝聚力；(3) 對本民族文化具有強烈的自豪感；(4) 淡化民族優越論，強化民族受害意識；(5) 崇尚和平。

而對於民族主義理解的角度，則大致可以分為三類：<sup>76</sup>第一類可以稱爲是民族主義的發展階段論，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一般認爲 1990 年代後期的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國社會國家的發展階段有密切關係，也就是說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官民共通的追求國家富強思潮造就了中國民族主義；第二類是回應式的民族主義，認爲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是由於外國如何對待中國所形成；第三類則是國家主導的愛國主義，認爲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促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而綜合上述特點，民族主義既然是中共針對冷戰後國際及國內情境轉變的反應，其所展現的特點也就充分的反應在國家針對國際及國內情境的轉變所設定的戰略目標上，這些戰略

<sup>72</sup> 王軍，「試析當代中國的網路民族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 期(2006)，頁 12。

<sup>73</sup> 「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gate/big5/gov.ce.cn/home/gqbg/200603/30/t20060330\\_6723087.shtml](http://big5.ce.cn/gate/big5/gov.ce.cn/home/gqbg/200603/30/t20060330_6723087.shtml)>

<sup>74</sup> 陳忠，「民族主義觀點與中日關係」，*上海大學學報*，第 13 卷第 4 期(2006 年 7 月)，頁 157。

<sup>75</sup> 同上註。

<sup>76</sup> George Wei & Xiaoyuan Liu ed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Perspective: Historical and Recent Cases*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 pp.2-3.

目標分別體現在政治外交、社會文化、國家安全與經濟戰略層面上，最終的目的將是使中國透過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過程而達到富國強兵。

在和平時期，國家的根本戰略是國家的發展戰略，這是國家的根本任務，是國家利益和國家戰略最高層次的東西，從 20 世紀 1970 年代末開始，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中華民族的奮鬥目標和叢崇高理想就是實現現代化，把中國建設成強大的國家。<sup>77</sup>而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在中共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及蘇東波的衝擊之後，雖然戰略目標仍然一致，但是如何達成卻遭到了考驗。根據諾布對於民族主義的分析模式來看，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顯然是國際及國內環境的種種危機情境的反應，而這種反應體現在文化、經濟與政治層面，形成知識分子的政治意識並發揮影響力，民族主義適時的與國家現代化戰略目標相結合，扮演了中國國家戰略目標的重要影響角色。

確立國家的戰略目標，也象徵著中國確立了冷戰後自身的基本定位，以戰略目標為基軸，確定國家的戰略利益；以戰略目標與戰略利益相結合，方能制定具體的戰術方案。<sup>78</sup>對於國家戰略利益的確定，中國學者經常對於國家利益進行優先排序，如閻學通提出，國家利益的排序是民族生存、政治承認、經濟收益、主導地位和世界貢獻。<sup>79</sup>門洪華則認為對達成中國的戰略目標而言以上幾個方面都缺一不可，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維護，應體現出大國眼光、大國氣魄、大國風度。<sup>80</sup>因此，民族主義為冷戰後中共的國家戰略目標增添了內涵，而根據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來看，以下將分別從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層面以及軍事安全的角度來說明。

首先，在政治層面上，最為關注的焦點就是民族主義與政權鞏固的關連以及

---

<sup>77</sup> 楚樹龍，「中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力量和國家戰略」，王緝思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國家利益卷**(台北: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339。

<sup>78</sup> 門洪華，「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維護與擴展」，王緝思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國家利益卷**，頁 353。

<sup>79</sup>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王緝思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國家利益卷**，頁 67。

<sup>80</sup> 門洪華，「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維護與擴展」，頁 375。

對國家主權統一維護的價值。民族主義與政權鞏固的目標，改革開放前，共產主義是凝聚中國民心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動員力量；改革開放後，中國採取「政左經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透過愛國主義的教育及灌輸，將愛黨與愛國結合，使得中共政權的鞏固成了國家富強、社會安定與民族振興的理所當然前提。此外，民族主義亦是作為國家統一以及地方分離主義遏止的目標，民族主義的強調除了針對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之外，也是針對台灣統戰的一大利器，在愛國主義的口號之下，兩岸的互動問題被歸類為祖國統一大業的問題；把兩岸分裂分治的問題歸類為台灣問題，亦即只要一天不統一，中華民族所蒙受的創傷就一天不能癒合，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鬥爭也一天不會結束。<sup>81</sup>

在社會與文化層面，冷戰後民族主義也在意識形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冷戰結束在早先官方意識形態破產所遺留的真空狀態下，民族主義適時的填補了這個空缺。而如今伴隨著中國的崛起，官方愛國主義的建構，除了用來凝聚人民的向心力，更扮演積極的推動國民健康的大國心態。<sup>82</sup>近來中共領導階層也相信中國和平崛起與發展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民族主義(rational nationalism)，而不是大眾的民族主義(popularism)，理性的民族主義不但可以展現出中國的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也可以向世界宣傳中國的傳統與民族特色，而大眾的民族主義則會危及共黨的一元政治論述以及政體的穩定。<sup>83</sup>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新一波民族主義是象徵著中國新一代的文化內涵，Gries認為冷戰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最大特徵是：構成份子主要是共和國第四代，目前正處於 30 歲左右的青年。這一代人沒有走過革命的戰火，也沒有受過西方帝國主義的凌辱，但為什麼會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他認為這根本的原因是第四代的

---

<sup>81</sup> 「台灣問題和中國統一白皮書」，*人民日報*(1993年8月31日)，版一。

<sup>82</sup> 關成華，「和平崛起需要青年具有健康的國民心態」，*北京共青團網*。  
<<http://www.bjyouth.gov.cn/special/lzag/gzdt/22827.shtml>>

<sup>83</sup> Xiaoxiong Yi,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Understanding China's Peaceful",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2005), p.108.

中國人想要通過愛國主義來突出自己的聲音。<sup>84</sup>

在經濟發展的戰略上，早在鄧小平時期就務實的將之運用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將民族主義與改革開放的經濟現代化目標相結合，這似乎也反映了中共民族主義具有的經濟目標，如同許多第三世界一般，運用民族主義作為達成發展的手段，只是在這當中勢必將面臨的矛盾就是，民族主義與西方現代化所帶來的價值衝擊，這是中共所不得不警慎面對的。

至於在軍事安全層面，除了對領土完整以及國家主權地位的維護之外，追求軍事科技化與現代化，也反映在中共民族主義的戰略目標之上。江澤民在 1996 年正式將科教興國的戰略與愛國主義結合在一起，並聲稱 21 世紀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將是全面振興的世紀，祖國在期待，人民在呼喚，黨中央號召全國各條戰線的科技工作者，在科教興國的光榮旗幟下團結起來。<sup>85</sup>軍事的科技化一方面可以反映整個經濟體系的實力，從國家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說，軍火工業的發展與進步，也直接代表著民族國家的權力與光榮，科技因而跟領土一般被視為是民族的基本利益之一，必須受到保護。

中國民族主義在冷戰後興起，具有國際及國內的一系列危機情境所導致，而其展現出的特點，也充分的反應出透過民族主義的凝聚力量，使得中共改革開放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層面的國家戰略目標得以一一實現。只是若從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民族主義是一把雙面甚至是多面刃，其負面的影響力更是諸多歷史悲劇的肇因，因此中國民族主義是否能帶領中國走向一條不同於西方歷史的道路，不但將影響未來中國崛起道路能否和平，也是未來西方如何面對中國的一項關鍵議題。

---

<sup>84</sup>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17-18.

<sup>85</sup> 江澤民，「科教興國」，*人民日報*(1995 年 5 月 27 日)，版一。